

一位公社女书记

1972 的 1982

日记

高双桂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一位公社女书记 1972 的 1982 日记

高双桂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0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位公社女书记的日记/高双桂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7

ISBN 978-7-5354-5207-8

I. 一… II. 高… III. 日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97860号

责任编辑:秦文仲

责任校对:陈琪

封面设计:雷新波

责任印刷:左怡 邱莉

出版: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027-87679362 87679361 传真:027-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武汉嘉亨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25.875

版次:2011年7月第1版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字数:424千字

定价:38.00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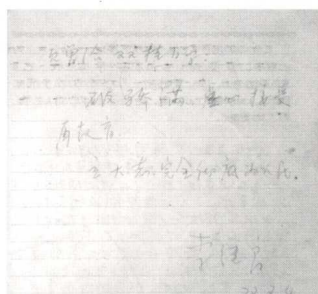
时代的剪刀影

题一位公社女书记的日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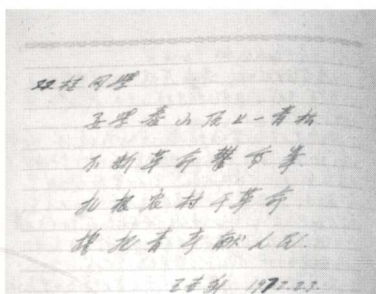
冯天瑜

辛卯夏
于武昌珞珈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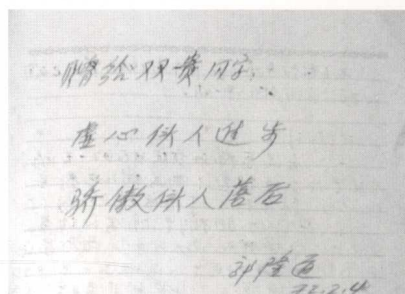




学校教务主任李继良赠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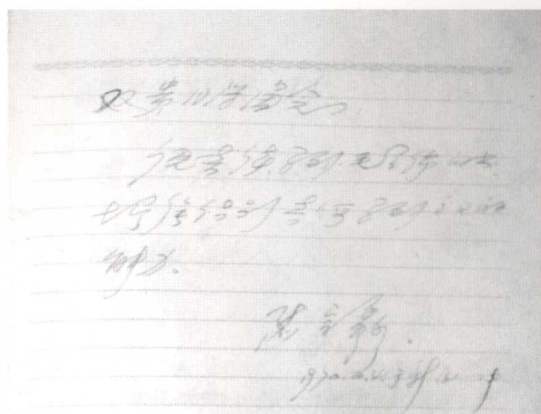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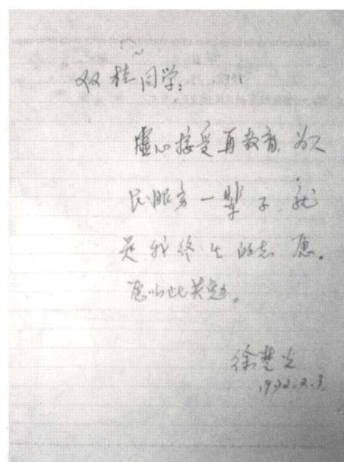
政治老师王世新赠言



化学老师郭隆道赠言



作者1972.2——1982.8共11本日记



新洲一中校支部书记熊宗森赠言

永恒的记忆

谭仁杰

一天，高双桂同志告诉我，她准备将高中毕业回乡接受再教育和在公社工作时的日记整理出来集结出版。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不是好玩的。其一，话题敏感，许多问题回避不了，况且，以日记的形式虽然真实但是太过于直白；其二，整理出版这个时段的日记目的是什么，弄不好会引起歧义，误读初衷。

然而我是赞同她的这个考虑的。因为这是一段无论是个人，还是我们这个民族都经历了并且无法忘记同时也不应该忘记的历史。它就个人而言，有青春的舞动、心灵的涤荡、前途的徘徊以及痛并快乐的成长；而就我们这个民族而言，有落后的艰难、发展的渴望、理性的紊乱、行动的张狂以及有着收获教训的成长。

在我看来，一个人到了天命之年，向前看的東西少了，往往同事同学同乡以及家人在一起会自然不自然地谈到过去。但是对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记忆与回忆并不完全是一种对过去历史的简单回忆，事实上这也不完全是一个痛苦的回忆。即使是今天，从某种意义上说，它还是一种红色的记忆。

我们都是同时代的人。尽管我作为最后一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只在农村两年半的时间，也没有高双桂同志那样的任职和长时间的经历，但我也短时间做过印刷工人，参与过社办企业管理，学习驾驶过上海丰收35和东方红履带式拖拉机以及江淮牌4吨小货车及至1979年考入大学。我在1993年出版的个人书法集中曾经写到，文化大革命在使我们这一代人失去读书机会和生活条

件的同时，却给我们提供了向社会，向生活学习的场所与机会。直到今天，这种收获都在深刻地影响着自己的价值观，做人做事，及至一言一行。

我以为，一个人在他的人生历练中，工人，农民，战士的角色至少应有其一。现在回过头来看，毛泽东同志当年提倡知识分子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撇开他的知识分子政策和阶级斗争的意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生产与劳动相结合，对于培养年轻知识分子的国家民族社会责任意识，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眼睛向下，对人民负责，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只是这种政策在后来偏离了正确的轨道，且对年轻人的未来的社会发展越来越不负责任。

作为一个长期从事教育的工作者，现在亦越来越感到，现在的青年人缺乏这种历练，这对他们的人生和社会发展并不利，同样，对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也不利。虽然我们不可能也应该避免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或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但是，采取新的有效的方式加强一代又一代青少年与基层，与民众，与实践，与社会接触和结合是今天全社会必须做的工作。

高双桂同志的日记的出版从另外一个角度为我们提供了对于今天的年轻朋友不曾经历的认知与感受。并从中可以找到一种融合社会、了解民生、理解民众的思维或路径。哪怕是批评乃至批判性地阅读，也是有意义的。

高双桂同志始终是一个有着强烈事业心和责任感的有心人，在那个年代，她怀着革命的理想，事业的梦想，带着服从和责任认真地做，同时也认真地记；今天，当她离开部门的领导岗位以后，她又认真地整理，认真地写，不仅是为了一份怀念，更多的是回顾，总结，反思，这就是一种责任，一种担当：对自己，对后人，对民族，对未来。

（作者为江汉大学党委书记、武汉大学教授）

序二

一段历程的记录

杨卫东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这一代人大都写过日记，但是坚持下来的很少，日日不辍者更是微乎其微。

记得有一个关于禅道的故事，弟子向禅师求教人生成功之道，禅师却教弟子做甩手运动，并要求他们“从今天开始，每天做300次”。一个月下来，大部分弟子都坚持了，半年下来，却只有少部分人在坚持，一年之后，坚持下来的只剩一个人。禅师把弟子们都叫到跟前，对他们说：“我曾经说过，做完这件事，你们就知道如何成功了。现在我想要告诉你们，世间最容易的事常常也是最难做的事。说它容易，是因为只要愿意做，人人都能做到；说它难，是因为真正能做到并持之以恒的，最终只是极少数人。”

高双桂老师从高中毕业开始记日记，坚持至今，足足写下75本，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奇迹！这奇迹归之于毅力，归之于坚持，更归之于胆略。文化大革命是文字狱盛行的时代，日记是内心的独白，作为一个公社副书记，独白涉及方方面面，没有一点胆略是难以坚持下来的。今天日记的出版，使我更深刻领悟到禅师关于“世间最容易的事常常最难做”的禅语。

我非常欣赏出版《一位公社女书记的日记》的创意。作者是一个从高中毕业生成长为公社副书记的女青年，是一个积极肯干、要求上进的基层干部，“还有记录国家重大政治事件的习惯”，是具有时代特征的典型农村青年代表，她的日记折射着一代人在那个特定时期的观念、思想与激情；日记截取的时代是文化大革命后半期与改革开放前期，它反映了两个时代的摩擦、交

汇与演变，这是一个极其典型、特殊的时期，也是最值得研究的时期。尽管这个时期距今只有30多年的历史，有大量的文献和资料可供我们研究。但是，在这个历史演变的过程中，农民的思想是如何发生变化的，基层干部的观念是如何在困惑中转变的，农村工作是如何在斗争中推进的，集体生产与联产承包两种生产模式是如何更替的。所有这些具体的、微观的素材今天都难以寻觅。日记是最原始的资料，记录着每一个细节，记录着亲历者的喜怒哀乐，它是一种历史的缩影，一段心理历程的实录。我相信它的出版对这一时期的经济史、政治史、社会史、民俗史、农村经济改革史以及妇女发展史的研究都会有较大帮助。

对于日记的编辑，我赞成只减不增的原则。所谓减仅仅限于两个内容，一是个人生活中纯属自己的隐私部分，需要继续珍藏的故事与心理活动；二是有关的人我是非部分，让可能引起痛苦的记忆由时间去抹平。除此之外，我不赞成更多的删减，包括当年的革命口号和现在看来是错误的流行语。我更不希望增加一字一句，任何的增加都是多余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原汁原味，才能体现它的原始价值。

当然，日记也有它的局限性。由于那个时代的原因，日记常常得不到保护，有被公之于众的危险。因此有些真实的思想不敢写，有些敏感的人与事被略写，甚至有可能假写。以我的经历而言，在雷锋日记、王杰日记的影响下，我写日记时潜意识中时常有一种希望被发现的冲动。这可能是我们这一代人都有过的心迹。但这无损日记的价值，正是这样的日记，才能反映这一代人，才能勾画那个时代的特征。

在历史研究中有一种类别称作口述史，主要是请某些亲历者或亲历者的后代回忆讲述不远的历史。口述史的特点是更加鲜活、更加细致、更加真实可靠。但是记忆往往是有筛选的，有些会忘记，有些会变异。从这个意义讲，日记是最好的口述史。解放以来，我国经历了很多重要阶段，很多亲历者已经作古和即将作古，我们应加大推进口述史的工作，抢救活史料，为我国当代史夯实基础。出版日记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工作。

因此，我衷心地祝贺贺双桂老师1972-1982年的日记出版，并希望她陆续出版1982年以后的日记。

（作者为江汉大学校长、教授）

序三

凄风苦雨寻公社

罗时汉

人生有许多缘分来自无意。最初是在江汉大学汉口校区认识高双桂，印象深刻的是她一口乡音，言谈话题很容易扯到农村。后来知道她曾经当了8年的公社党委副书记，无怪乎她的农村情结、农民情绪那么深那么重。2007年的第二天，她约我们一同到过去的公社看看。我早就想对昔日闻名全国的刘集公社作一次寻访，也就欣然前往。

那天，雨仍然是又湿又冷，甚至夹着雪。在浓得化不开的沉郁中，似不辨方向地前行，大约是往东。

对她来说，这是回去，这是追寻。而我们只是陪同，只是参观。当时最年轻的她，要寻找年轻时的自己，寻找年轻时的人民公社。作为个体的自己和集体的家园都没有分开，那是一个整体，都淹没在浓浓的雨雾中。

刘集公社，一个曾经怎样辉煌的名称啊！全国农业两面红旗之一，大寨是艰苦奋斗的典型，刘集是农业机械化的典型。当时的口号是：学大寨，赶刘集！而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刘集的典型意义在于艰苦奋斗之后的提高阶段，极大地解放农民的生产力，使他们可能迈向小康。解放五十多年来，湖北在全国叫响的只有新洲刘集，在新洲划归武汉之后，刘集就成了武汉曾经有过的光荣，但这一光荣早就褪色了、黯淡了，甚至被人遗忘了。

这个大名鼎鼎的公社所在地门口是一条大道，从这条大道还能看到当年的公社大院何等气派，四合院，主楼是四层。然而，我们走进的是一座空城，二十年前公社撤销之后，这里就开始式微。楼层空无一人，里面能拆能

下的门窗都没有了，连楼梯铁栏杆也被人割除卖了钱。大院里成了菜地，种菜的人说，这些房子想卖掉，但没有人买。

刘集公社闻名全国的陈金阶书记一家原来就住在这栋楼上，五年前去世了。真巧，大寨有个陈永贵，刘集有个陈金阶。陈永贵去了，陈金阶去了，人民公社撤了，他们带走了一个时代！

“机车轮驰进千家万户，喇叭声响彻农村四野。”我们找到原来的农机站，那里还有两栋房子，一栋是职工宿舍楼，一栋是办公楼，连陈永贵都来过的，据说很快也要拆掉。而这栋楼里面不知何时办起了养鸡场，鸡粪堆积，狗子狂吠，连养鸡人也不知我们来干啥。

与刘集毗邻的就是当年高双桂所在的联合公社。当年的联合公社学习刘集直至赶超刘集，后来成了水田机械化的典型。比学赶帮超，红红火火的年代，农业机械化演绎了人民公社的全过程，成了那一代人为之竭力付出的全部目标。

一路上，她都在讲述往事：第一次党委会捡砖头坐在地上开会的激情；社员赤身裸体抗洪的壮举；夜深回屋时吃房东太婆夜宵的温馨；与拖拉机手田间作业的喜悦；划等号当社员挥汗战斗的岁月……

冒着风雨，踏着无处下脚的泥泞，我们走在联合公社的旧址上。这里仅留下一排平房，是原公社13个党委委员的办公室兼卧室，因卖给了农民住家，都一一打上了“汪集镇屋基墩”的门牌号。而原来的院落式布局，那些卫生院、武装部等等，早已不存，遗址上长满了杂树。走近过去的岁月任风雨飘零，高双桂疯子一样站在河边发呆！

与公社毗连的是条十字街。她介绍，这里供销社、银行信用社、粮食交易所、生资公司四大家各占一方，是政治经济的中心。现在剩下的只有两栋空屋，上面尚存的标牌字“中国农业银行”、“新洲县粮食局联合交易所”还见证着它们的昔日尊容。人们和机构都奔交通发达的公路沿线而去，没有拆掉的这两栋屋相对无言，像两个孤独无助的老人，等待寿终正寝。

高双桂本能地朝路边走去，那是过去的公社粮库，一溜长形的库房上还有粮食收购价目表，小麦、粳稻、晚粳，丰收不忘国家，踊跃交公粮，统购统销。这些记忆深处的元素，会从有农村记忆的脑际挥散出来，包括麻雀来贪嘴聚餐的场面。而这一切不复存在，那两栋并列的圆型仓库，红砖尖顶，造型若塔，具有建筑美学价值，大门紧锁，再无实用价值了。

雨仍下个不休，似天在落泪。来到机械站旧址，只有孤独的半截楼房，住着一户农民约五十多岁。他们认出了当年的书记，惊讶而亲切。农民投诉

似地指着这一片荒芜的土地，机械站都拆了分了，拆院子时这儿还打死了一个人。随着农民的手所指处，我看着高双桂的脸色大变，泪水和着雨水淌着，这意味着她的内心在怎样地伤痛啊。

她说，这些都是新的，都是我们从我们手上修起来的呀。声音颤抖，像不胜严寒的哆嗦。回到车上，她不再言说。

是的，三级沟是公社时期挖的，上面还修了一道道桥；沟边的路是她当指挥长修的，工程名称叫“万米公路”。这里的一沟一壑，一草一木，都有故事，都能勾起她的回忆。而我们只能从她的表情上看出，即使是当年的欢乐，也变成了今天的伤痛，即使是当年的自豪，也变成了今天的惆怅。

那次，我们抢救性地采访到几个人，包括高双桂与农业机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哥哥高怀卿和前机械局副局长姚海东，联合公社党委书记沈忠孝，搜集到有关人民公社的一些记忆碎片。

高双桂的脑子里有无数个公社故事。

新洲以前有个七女公社很有名，领导成员全是女的；吴荷荣这位妇女干部先驱刚刮伢就下水田，没满月就拖水车，落得一身的病；沈忠孝书记一顶破草帽一双草鞋与社员挑草头……

1974年堂兄从坦桑尼亚带回一把折叠伞。因要到大寨参观，高双桂去刘集换全国粮票。当时众人围观这把伞，就是打不开。陈金阶来打开了。过后，11月份她当了副书记，有人说，高双桂有小资产阶级思想，打洋伞。

防汛紧张时，在围垦区细白湖。她去检查灾情，有人说高书记你站一下。原来是农民们都脱光了堵水，见她过去那些社员都蹲在水里。她当时是个大姑娘，又只她一个女的……

难得的是高双桂保存着十几本公社时期所记的日记，她还保存着那时工作笔记、手稿、调研数据等一批原始资料。

个人的记录如果反映的是一个时代，这部作品既是个人的记忆，也是国家的记忆，或者称为个人的国家史。

当第一次看到高双桂的那些日记，我感觉她是个奇人，是个有意志的人，是个珍惜生活的人。在她面前，年长几岁的我感到汗颜。我也曾记过日记，但是断断续续。而高双桂是每天记日记直到今天，就是在产后当天，她也拖着虚弱的身子记下当时的情景。我曾参与编辑她所整理的儿子的《成长日记》，在儿子的婚礼上献给他。这是作为母亲的一份多么厚重的礼物啊！

受她的委托，我怀着好奇于2011年逐字逐句地校读了高双桂的这本书的清样。感慨很深的首先是，它展现了那个革命时代的“工作狂”，几乎每天

都要开会，有时一天几个会，早上开、晚上开、田间地头开，有那么多工作要讨论研究、作出决策、采取措施；而且这些会大多是在业余时间进行，既不影响生产，也不脱离群众。作为年轻的女子，高双桂无时不刻不想着集体的事业、生产的进度、群众的疾苦，她的全部身心除了工作还是工作，这种对工作的投入和“呕心沥血”，在今天看来匪夷所思，但在那个年代可能十分正常。因此，我觉得这可以作为一部教材、一部传统教育的读本，让现在的干部（特别是农村干部）看一看，想一想，有个比较。即使我们不能再强求今人仿效昔人，也可以扪心自问自己是否具有干部的基本品质和能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毕竟是不能违背的宗旨。

“他的心里只有群众，惟独没有自己。”这是当年人们对焦裕禄的评价。我想那个年代的干部大多数都是这样，高双桂理应如此。但是，读着日记，我有些痛心，她似乎失去了自我，或者只能是属于党所要求的革命者，从这里我们看不到她生活的其他内容，好像除了工作的热情和是非的分明，再没有七情六欲。当然，字里行间仍能读到诸如她对亲人的情感记录，好像有些避讳，但深含着忠孝难以两全的痛楚，也有工作的矛盾苦闷。更多的隐匿，只有她自己能够读懂。

不用讳言。这些日记中，有些私人性的日常生活化的语言不多，而集体化的政治口号似的语言不少。这在那个时代是很正常的。我的下放日记中，有些内容不敢写，有的写了竟自我剪掉，生怕被别人抓住政治把柄。思维和语言的共性多于个性，这正是那个时代的特点。

事实上，高双桂并不是全盘托出了她的原始日记，而是进行了“革命化”的处理，删除了原来的很多内容，这些内容有的是她认为不能公开的。从70多万字的“草稿”砍到这个样子。我对她说过，若我来进行前期编辑，就可能更多地留用一些有趣的篇章，使它不仅仅是“工作日记”。不管怎么说，高双桂完成了自己最想完成的事，她付出了很多辛劳，把《一位公社女书记的日记》献给为之奋斗的人民公社，献给建党90周年，这是她为自己、为家乡、为国家表现的最大热爱。

人民公社在中国大陆时兴了近30年，而现在已全然不见了踪影。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曾经感叹过：全国的人民公社有2万多个，现在想找到一块人民公社的标牌已不可能。这种现象说明，在中国，很多事情其兴也勃，其衰也速，如大浪来去，冲刷干净。前不久，我在福建南靖县的田野里居然看到几座土高炉，真是非常惊奇。

但是，人民公社留给人民的记忆和思考是不可冲毁的。我虽只当过一年

多的“蒲圻县革命委员会琅桥人民公社红光大队六小队”社员，对公社的感情还是很深的，曾记得到公社开会、到公社送公粮、和公社书记在田间交谈，当时有说不出的兴奋。

现在反思，人民公社留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呢？且不说它产生的原因和发展的过程以及为什么要突然取缔，这是政治家和学者们思考研究的事。取缔后的结果究竟怎样，倒是可以总结的。

其一、当年一声令下公社下马，第二天就分田分物到户，集体经济积累的生产资料包括机械设备全部拆分，变成只可以变卖的废铁。“艰苦奋斗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这种一窝蜂、一刀切的做法，是对生产力的极大破坏，也是对民心的极大损伤。事实证明，这种做法在许多地方造成了历史的倒退。我们这么大的国家，应该允许有多种生产经营方式和不同的所有制，像河南临颖南街村、江苏华阴华西村等地，坚持集体所有制，同样能够发展繁荣至今。

其二、我们往往只考虑推倒一个事物，而不考虑建立一个事物，以为“大破大立，破字当头，立字就在其中”。事实是，我们并没有在农村建立起新的比较完善的承续机制。去年西南五省大旱，最近湖北湖南大旱，主要原因是各地农田水利设施多年失修且大量破坏，农民无能为力，只有依靠政府投资挽救。“临时抱佛脚”，绝非长远之计。

其三、去年年底，我在台湾旅行走马观花，还特地去看了台南地区农会，了解到他们服务农民、为农民推广农作物销售的情况。回来后了解，台湾农会有一百年的历史，是具有经济性、教育性、社会性、政治性四大功能的非盈利社团法人组织，其运行机制很是成熟。现在有很多大陆学者和政府官员到台湾考察，不妨以他们为借鉴，探讨我们的农业出路。

我有幸结识高双桂，并见证她整理这本日记的艰难过程。读着这本原汁原味的日记，从中了解农村的过往，相信人们勾起的不仅仅是记忆，还会引发对农村现实和未来的诸多思考。同时近距离地了解到高双桂其人：过去她用青春生命奉献人民公社，今天她用激情和智慧进行农村教育与教师队伍建设研究，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她不变的真诚。

记录历史的人，应当被历史记住。

（作者为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前言

我与日记

最初听到关于日记的故事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那还是在读高中时听同学们议论，写日记弄不好会惹大麻烦。有的同学还说绝不写日记，不给自己找苦吃。“文革”期间，日记确实给不少人带来过灾难。我们新洲县委的一些老领导，有的是抗日战争时期的老革命，有的是解放战争时期的功臣，但在“文革”开始后打成了“走资派”。红卫兵抄家时发现的日记竟成为了他们的罪证。有位领导长期任副职，曾在日记中抱怨过“副、副、副，副伤了我的心”，被戴上“野心家”的高帽子满大街游斗。还有一位领导在日记中赞扬过某位女同事的美丽和能干，结果被批为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大字报铺天盖地被批倒批臭。

我写日记出自于对学习生活的渴望。高中毕业后回农村，那时几乎没有学习条件，没有书籍，全大队才有一张《湖北日报》。我们的文化学习缺失显而易见，我担心刚学的一点知识会被紧张的劳动冲掉，想用记日记的方式来约束自己学习。当时写日记还因为有个条件，就是日记本。我们作为“文革”中的第一届高中生，第一年的学费是6元5角，很多同学都交不齐。正值水灾后很多同学还不知道吃饱饭的滋味，饥饿一直伴随着我们。第二年学费只要1元5角钱，学校组织我们勤工俭学，主要是挑沙填屋基之类，一年下来除支付学费、班费还有结余的钱。团支部征求意见后给每人买了一个笔记本作为“毕业纪念”。我如获至宝，它不仅可以用来写日记，还因为那上面有我们新洲一中的老师、领导、同学的赠言，日记可以天天翻阅，犹如老师同

学还在身边。我不知道日记文体应该如何写，老师也没讲过，只看到过雷锋日记，自然受到很大的影响。再看到鲁迅日记那是上大学后的事了。我写日记只是对一天的劳动做一个记载，第一本小小的日记本伴随我三年，记录着我接受再教育的大部分生活。尽管写得很简单，但每天用几句话记录自己的劳动和感受是我莫大的享受。

养成写日记习惯并能坚持下来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记得回到乡村后，家里没有可供我写字的桌子，一张方桌在堂屋中间那是父亲和兄长占用的，我写日记从来没有端坐在桌子上。在农村大多要开夜工，要么就是晚上开会，等忙完了这些，年长的家人都要休息，三代8口人挤在一间屋里。我只能在和母亲居住的小小房间里，用砖头垒起一个简单的工具箱（二哥上水利利用的）当桌子。那时没有电灯，只能用墨水瓶装上柴油（煤油要计划）坐在小板凳上学习和写日记。屋里四面透风，夜半醒来的父亲发现我还在看书，就拿棍子敲，大声斥责。我将深色衣服挡住灯光，听到父亲鼾声后，又开始学习。父亲反对我每夜点灯夜读，不单是影响了休息，还认为我做的事毫无意义。父亲因家穷只读了半年书，却一生尊重读书人，记忆力特强，对后代寄予厚望，对我和姐姐则从来不寄过多希望，还曾反对我上高中。父亲的反对不仅没有阻止我，反而成了我不服气与他对着干的动力。但日记要坚持写下来还是很难，经常性开夜工和开会，睡眠不足，累得拿不起笔是常有的事。更难坚持的是上水利工地。如1974年元月到湖区围垦，我们住的是又低又小的布棚。每晚在寒冬的露天下洗掉脚上的泥沙后，一个一个爬进棚内睡觉，而每人的铺位只有一尺多一点，只能侧着睡，要翻身大家一起翻。棚内没有灯，根本没有办法学习和写日记，每晚我只能站在外面借着用农药瓶做的油灯微光写一下。月光明亮时我就站在露天写日记，哪怕几个字，写了心里才踏实。

我也曾对写日记产生过动摇。因为在那特殊的年代，剧烈的政治动荡我们自然被裹挟其中。我曾是被批林批孔的积极分子，1975年我在一本书中知道孔子对中国教育的贡献，一次党委会前谈到此事，我说了一句孔子在中国历史上也有贡献的话。1976年党委整风会，有位领导说我的思想很反动，这是公开对抗毛主席的指示，要为孔老二翻案。1976年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我们还上街游行过，1977年整风时又有人提出我与“四人帮”有关系。那段时间左右摇摆的政治局势，的确让人困惑。有些好心的同志知道我在写日记，还有记录国家重大政治事件的习惯，建议我快将日记烧掉，以免今后被别有用心的人抓小辫子。我真的很苦恼。曾经在民主生活会上说过，

我没有先知先觉，不可能一贯正确，说我受“左”的思想影响我承认，说我与谁有联系只有请组织调查了。我是一名党员，过去我相信党相信中央，现在一样相信。经过激烈的斗争，我没有烧掉日记，依然坚持写下来。

日记也曾给我的生活带来了麻烦。那是1981年婚后，我的日记除了工作学习还有个人情感的记录，先生看了后就有一些猜测，有时还为其中的一段内容刨根问底。我对此很反感，经常闹得不愉快。我真的准备将10年来的日记付之一炬，再也不写什么日记了。最终还是下不了决心，因为日记已融进了我的生命，舍弃它无异于舍弃生命，我做不到。后来我将其所有质疑的内容抄了下来，分别送给了他的一个长辈和组织部的一位老领导，让他们去评。我却继续写下去，从过去的两年一本，到后来一年一本，再后来一年二三本，至今一年四本地写了下来。

日记之于我是一条鞭子，它可以鞭策我不至于懈怠。特别是组织、领导、老师、同事给我的批评，逆耳之言我都有忠实的记录，以此来警醒自己。1975年3月1日“拆区并社”机构变革和“老中青”相结合，不到21岁的我被任命为联合公社党委副书记。面对职务的提升和新的工作岗位，我在高兴的同时也陷入茫然。回到新洲一中我的母校时，政治老师王世新没有给我过多的赞扬，而是冷静地分析了我所处的形势和面临的任务，以及应该努力的方向。他给我讲了三个观念：不要将自己看成一枝花；不要做空中楼阁；不要做昙花一现的人物。这三个观念我记在日记本上，更记在心里，它的警示作用无异于一服苦口良药，让我终生受益。如今我已是知天命之人，但当年老师的三点告诫音犹在耳。

1977年在黄冈地委党校学习期间，时任新洲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曹继安热爱学习、勤于思考、不断探索研究的精神深深感染了我。他告诫我在工作中要“多学、多想、多实践、多做事、立足于实，克服浮躁”，这真是金玉良言。至今我保存着他给我的几十封信件，每当翻阅时，依然感到一种无声的鞭策。

而今日记已成为我生活的组成部分，再也分不开了。她记录的不仅是过去的岁月，还有友情和那些历史事件。日记更成为生活的挚友，高兴的、不高兴的大事小事我都记录。烦恼时我向她倾诉，高兴时我让她分享。日记伴随我走过了四十个春秋，伴着我从青年走向中年，还将一直走向老年。在朋友们的支持帮助下，我将1972年至1982年在农村生活工作的日记呈现出来。那是一段青春的记忆，收藏着友谊和激情；那是一段难忘的历史，属于那个时代，依然散发着泥土的清香。尽管那时的我是幼稚的、无知的，但历史无